

国学篇

饶贵民
王杰 主编

国学大讲堂 领导干部

李瑞琦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国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中国孔子基金会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

联合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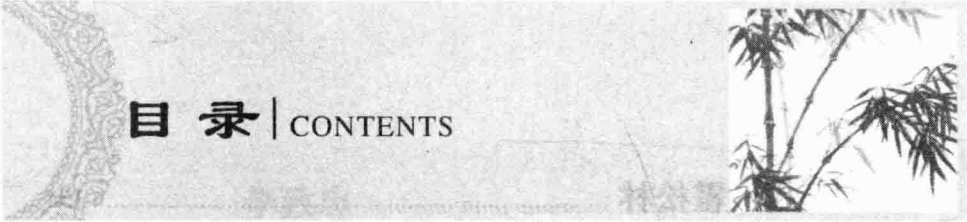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国学篇

饶贵民
王杰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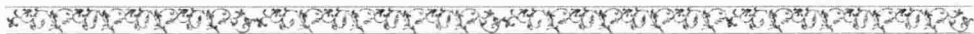
目录 | CONTENTS

国学篇

【香港】饶宗颐.....	003
我和敦煌学	
余敦康.....	011
《周易》中的决策管理思想	
杨力.....	041
《易经》的智慧	
程水金.....	082
《诗经》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价值	
吴如嵩.....	103
《孙子兵法》军事思想及现代价值	
葛荣晋.....	117
《孙子兵法》与“情绪管理”	
冯其庸.....	131
漫谈《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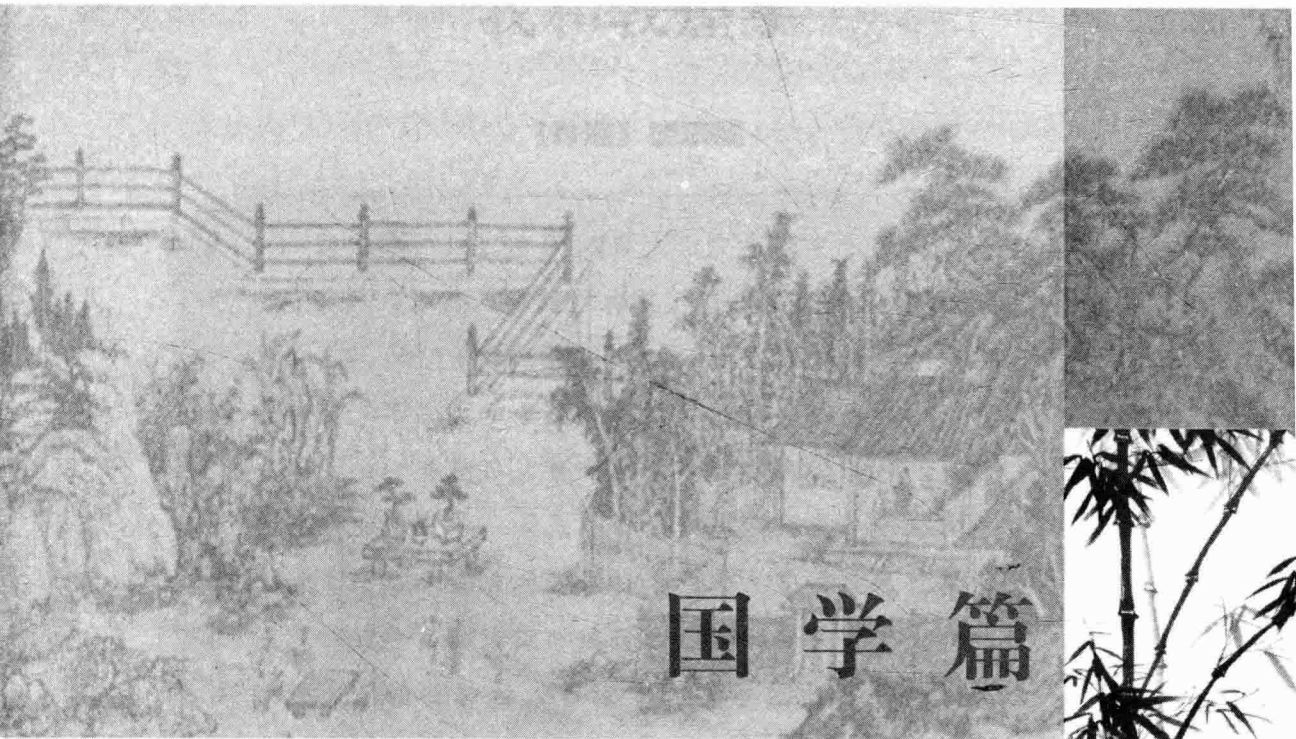


霍松林	154
论绝句的起源、类型、特征及艺术鉴赏	
叶嘉莹	168
当爱情变成了历史——晚清的史词	
杨义	189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	
楼宇烈	211
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姜广辉	225
儒家经学中的十二大价值观念	
张希清	250
“清、慎、勤”——为官第一箴言	
孙家洲	261
汉武盛世的历史透视	
邢福义	278
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	
朱汉民	295
书院精神与中国文化	
王宁	320
汉字与中华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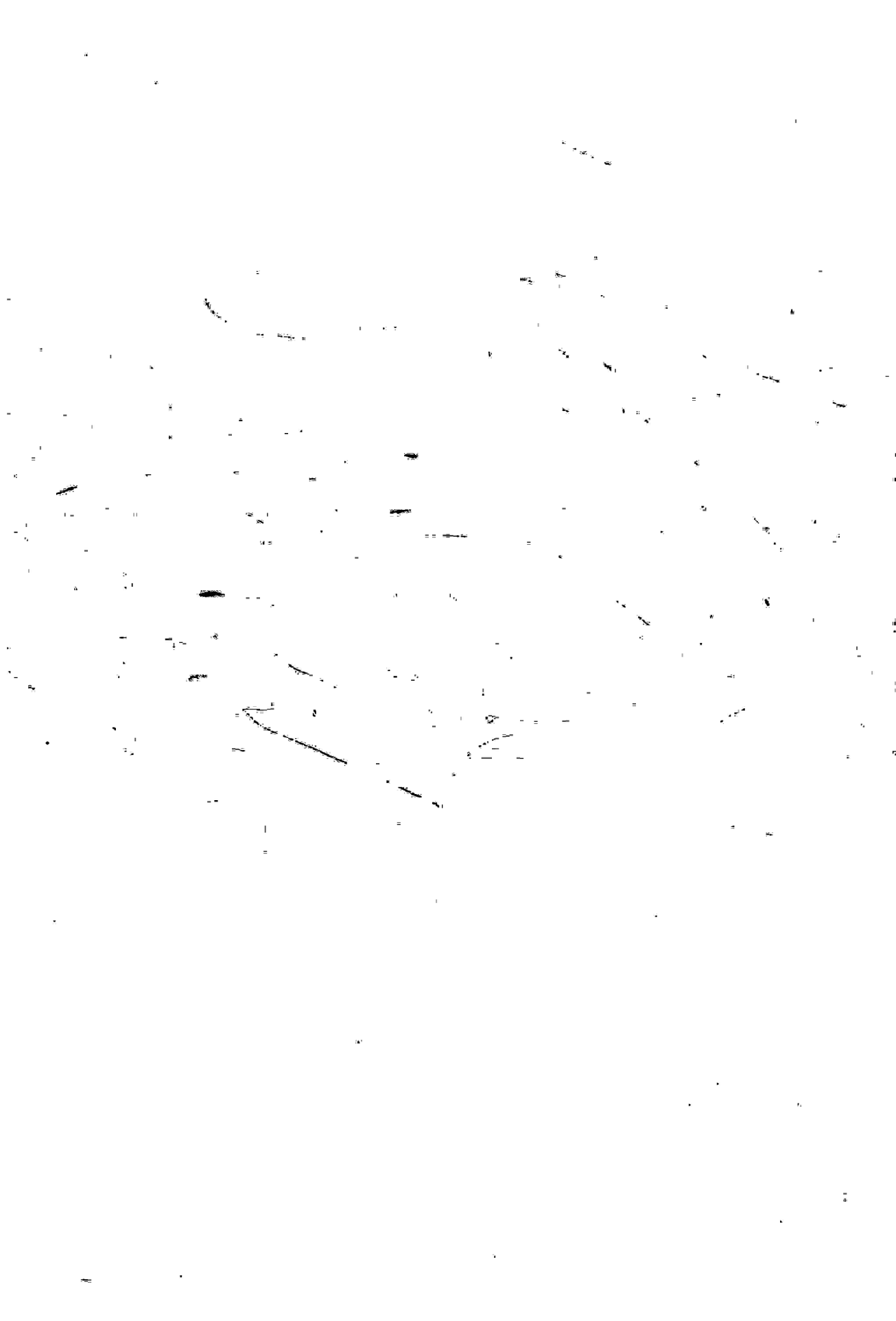
李致忠	335
中国书籍的起源及其形制的演变	
彭 林	359
礼与中国人文精神	
刘笃才	380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形式与内容	
郭齐家	403
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点	
董光壁	415
中国科学传统及其世界意义	
王渝生	442
中国古代科技与传统文化	
孙小淳	459
天人之际：中国古代的天文学	





国学篇







我和敦煌学

【香港】饶宗颐

饶宗颐，1917年8月9日生于广东潮安。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幼耽文艺，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院校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并先后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1973年回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其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文、敦煌学、古文字、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音乐、词学等，均有专著，出版书40种，学术论文过300篇。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隶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家中“天啸楼”藏书达十余万卷为当时粤东最富盛名的藏书楼。

敦煌学在我国发轫甚早。我于1987年写过一篇《写经别录》，指出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他已十分关注石窟经卷发现与散出的事情，有许多重要的报道。近时荣新江兄发表《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一文，刊于伦敦IDP News 1997年第7期，说得更加清楚。

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国内敦煌研究，寔成显学，专家们迎头赶上，云蒸霞蔚，出版物包括流落海内外各地收藏品的影刊——英、京、俄、法以至黑水等处经卷的整理集录，令人应接不暇，形成一股充满朝气的学术生力军。以往陈寅老慨叹敦煌研究为学术伤心史，现在确已取得主动地位，争回许多面子。此后，海外藏品，陆续影印出来，学者们不必远涉万里重洋，人人可以参加研究了。

我一向认为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不过是历史上的补充资料，我的研究无暇对某一件资料作详细的描写比勘，因为已有许多目录摆在我们的面前，如英、法两大图书目录所收藏均有详细记录，无须重复工作。我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在某一历史问题上关键性的意义，这是我的着眼点与人不同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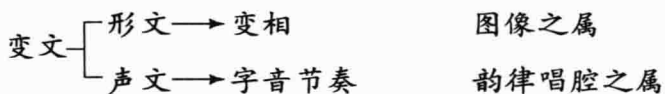
张世林先生两度来函，要我写《我与敦煌学》一文，万不敢当，久久不敢下笔。我本人过去所做的敦煌研究，荣新江兄已有文评述，见于复旦大学出版的《选堂文史论苑》(265—277页)，我的重要著述和对学界的影响，详见该文，不必多赘。现在只谈一些值得记述的琐事，追忆我如何对敦煌资料接触的缘遇。

我最先和敦煌学结缘是因为从事《道德经》校勘的工作。1952年我开始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那时候《正统道藏》还是极罕见的善本，我还记得友人贺光中兄为马来亚大学图书馆从东京购得小柳气司太批



读过的《正统道藏》，价值殊昂，当时香港及海外只有两部道藏，无异秘笈。我因代唐君毅讲授中国哲学的老、庄课程，前后三载，我又研究索纁写卷（有建衡年号），做过很详细的校勘工作。我和叶恭绰先生很接近，他极力提倡敦煌研究，他自言见过经卷过千件，对于索纁卷他认为绝无可疑（可参看他的《矩园余墨》）。以后我能够更进一步从事《老子想尔注》的仔细探讨，实导源于此。正在这时候，日本梗一雄在伦敦拍制Stein搜集品的缩微胶卷，郑德坤先生方在剑桥教书，我得到友人方继仁先生的帮助，托他从英伦购得了一部，在20世纪50年代，我成为海外私人唯一拥有这部缩微胶卷的人物。我曾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的伦敦读敦煌卷的初步记录核对一遍，这样使我的敦煌学知识有一点基础。我讲授《文心雕龙》亦采用英伦的唐人草书写本，提供学生参考。1962年，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年刊》印行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号》最末附印这册唐写本，即该缩微影本的原貌。当时我已怀疑梗氏拍摄的由第一页至第二页中间，摄影有夺漏。1964年我受聘法京，再至伦敦勘对原物，果有遗漏。这一本专号所复印，实际上是唐本的第一个（有缺漏的）影印本，如果要谈《文心雕龙》的版本，似乎应该提及它，方才公道。

所谓“变文”，本来是讲经文的附属品，源头出于前代陆机《文赋》“说炜晔而譎诞”的“说”，与佛家讲诵结合后，随着佛教在华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崭新的“文体”的变种。但从“变”这一观念加以追寻，文学有变种，艺术亦有变种，两者同时并肩发展，和汉字的形符与声符正互相配合。文字上的形符演衍为文学上的形文，文字上的声符演衍为文学上的声文。刘勰指出的形文、声文、情文三者，形与声二文都应该从文字讲起。所谓变文，事实上应有形变之文与声变之文二者。可是讲变文的人，至今仍停留在“形”变这一方面。古乐府中仍保存“变”的名称，声变则凡唱导之事皆属之。试以表示之如下：



我写过一篇从《经呗唱导师集》第一种《帝释天乐般遮琴歌呗》加以说明的文章。姜伯勤兄因之撰《变文的南方源头与敦煌唱导法匠》，唱导是佛经唱诵音腔的事，我所说变文的声变之文应该是这一类。大家热烈讨论形变之文的变相，只讲到“变文”的一面，对于声变之文这另一面则向来颇为冷落，甚至有误解。王小盾博士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可惜不少人至今尚不能辨析清楚。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邸与僧人讲论的是“转读”问题，即谋求唱腔的改进，与声调完全不相干。到了唐代教坊有大量的“音声人”，音声人还可以赏赐给大臣。《酉阳杂俎》记玄宗赐给安禄山的物名单，其中即有音声人一项，《两唐书·音乐志》音声人数有数万人之多。敦煌的乐营有乐营使张怀惠(P·四六四〇)与画行、画院中的知画都料董保德(S·三九二九)相配合，一主声变的事务，一主形变(变相)的事务，两者相辅而行。变文之音声部分，还须再作深入的研究。敦煌乐舞方面，亦是我兴趣的重点，我于1956年初次到法京，看了P·三八〇八号原卷，写有专文补正林谦三从照片漏列的首见乐曲的《品弄》谱字，由于我在日本大原研究过声明，又结识林谦三和水原渭江父子，对舞谱略有研究。我于1987年初提出研究舞谱与乐谱宜结合起来看问题，我讲敦煌琵琶谱，仔细观察法京原件及笔迹，事实是由三次不同时期不同人所书写的乐谱残纸，黏连在一起，把它作为长卷，长兴四年才写上讲经文，可以肯定琵琶谱书写在前，无法把它作为一整体来处理。叶栋当它全部视为一套大曲是错误的。我这一说已得到音乐界的承认。我主张乐、舞、唱三者应该联结为一体之说，引起席臻贯的注意，他力疾钻研乐舞，把它活现起来，因有乐舞团的组织，我忝任顾问，他二度到香港邀我参观，深获切磋之乐。1994年9月6日我到北京，在旅馆读China Daily的文化



版得悉他病危的噩耗，十分痛惜。1995年7月，敦煌乐舞团随石窟展览莅港表演，我追忆他写了一首律诗云：“贺老缠世所夸。紫檀拨出琵琶。新翻旧谱《胡相问》，绝塞鸣沙不见家^①。孤雁忧思生羯鼓，中年哀乐集羌笳。潜研终以身殉古，叹息吾生信有涯。”表示我对他的哀悼。

敦煌各种艺术尤其是壁画，我是最喜欢的，由于长期旅居海外，无条件来作长期考察，无法深入研究，只得就流落海外的遗物作不够全面的局部摸索。我所从事的有画稿和书法二项。我们深感唐代绘画真迹的缺乏，所谓吴道子、王维都是后代的临本。1964年我在法京科学中心工作，我向戴密微先生提出两项研究工作，其一是敦煌画稿，后来终于写成《敦煌白画》一书，由远东学院出版。我年轻时学习过人物画像的临摹，有一点经验，我特别侧重唐代技法的探索，粉本上刺孔的画本，法京有实物可供研究，亦为指出，我方才明了到，布粉于刺孔之上留下痕迹断续的线条便于勾勒，这样叫做粉本。近日看见胡素馨(S. F. Fraser)的《敦煌的粉本和壁画之间的关系》一文(《唐研究》三期)，文中在我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粉本草稿有五种类型，计壁画、绢幡画、藻井、曼陀罗四类，绢幡画则可分临与摹二类。实则临与摹二者，临是依样而不遵照准确轮廓，摹则依样十足。这些画样，画人运用起来可以部分摹、部分临，亦不必限于幡画。

书法的研究，我在接触过Stein全部微卷之后，即加以重视，立即写一篇《敦煌写卷的书法》附上《敦煌书谱》，刊于香港大学1961年的《东方文化》第五卷。后来居法京排日到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借阅敦煌文书。先把法京收藏最早的北魏皇兴五年书写的《金光明经》和永徽年拓本的唐太宗书《温泉铭》作仔细的研究。以后遍及若干重点的经卷写本，作过不少专题研究，除作解题之外还注意到字体的花样，1980年秋后在日本京都讲学，承二玄社邀请为主编《敦煌书法丛刊》，分类影印，从

^① 庄严所藏敦煌《浣溪沙》佚词，起句云“万里迢亭不见家，一条黄路绝鸣沙”。

1983年起，月出一册，共二十九册，前后历时三载。每一种文书都作过详细说明或考证。由于翻成日文，在国内流通不广，周绍良先生屡对作者说“各文书的说明，极深研几，应该合辑成一专书，独立出版”。至今尚无暇为之。本书又有广东人民出版社刊印本，题曰《法藏敦煌书苑菁华》共八册。

我于1963年出版《词籍考》一书，戴密微先生了解我对词学薄有研究，约我合作写《敦煌曲》，由于任老旧著《敦煌曲校录》录文多所改订，与原卷不相符，须重行勘校，我又亲至英伦检读原件，时有弋获，如《谒金门》开于阆的校录、五台山曲子的缀合等等。任老后出的《总编》和我有一些不同看法，特别对《云谣集》与唐昭宗诸作，我有若干专文进行讨论，已收入另著《敦煌曲续论》中（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昭明文选》的敦煌本，亦是我研究的专题，我首次发表敦煌本《文选》的总目和对《西京赋》的详细校记，我现在汇合吐鲁番写本另附精丽图版与详尽叙录勒成专书，将由中华书局印行。

《文选》序有“图像则赞兴”一句话，我作了详考，在《敦煌白画》里面，我有一章讨论邈真赞的原委。法京友人陈祚龙君从敦煌写本邈真赞最多的P·三五五六（九人）、三七一八（十七人）、四六六〇（三十九人）三卷及其他录出，辑成《唐五代敦煌名人邈真赞集》一专书，开辟一新课题，继此有作，得唐耕耦、郑炳林二家。1991、1992年间余复约项楚、姜伯勤、荣新江三君合作重新辑校，编成《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方为集成之作。

所谓敦煌学，从狭义来说，本来是专指莫高窟的塑像、壁画与文书的研究，如果从广义来说，应该指敦煌地区的历史与文物的探究。汉代敦煌地区以河西四郡为中心，近年出土秦汉时期的简册为数十分丰富，尚有祁家湾的西晋十六国巨量陶瓶。又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敦煌郡所领的冥安县佛经题记。所以广义的敦煌研究应该推前，不单限于莫高窟的材料。



1987年得到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协助，与中文大学合作举办敦煌学国际讨论会。1992年8月，该中心帮助我在香港开展敦煌学研究计划，在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成立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延揽国内学人莅港从事专题研究，由我主持出版研究丛刊，主编专门杂志。先时于《九州学刊》创办《敦煌学专号》，出过四五期。后来与北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合作，办一杂志即《敦煌吐鲁番研究》，由季羨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每期三十万字，至今已出版第一卷（1996）、第二卷（1997），第三卷正在排印中。此外香港敦煌吐鲁番中心复出版专题研究丛刊，由我主其事，先后出版者有八种。我提倡辑刊《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用编年方法，把新出土零散史料加以编年，使它如散钱之就串，经过数年工夫，已稍有可观。

兹将香港敦煌吐鲁番中心已出版《敦煌吐鲁番中心研究丛刊》开列如下：

- (1) 饶宗颐主编：《敦煌琵琶谱》。
- (2) 饶宗颐主编：《敦煌琵琶谱论文集》。
- (3) 饶宗颐主编：项楚、姜伯勤、荣新江合著《敦煌逸真赞校录并研究》。
- (4) 荣新江编著：《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
- (5) 张涌泉著：《敦煌俗字研究》。
- (6) 黄征著：《敦煌语文丛说》（获“董氏文史哲奖励基金”一等奖）。
- (7) 赵和平著：《敦煌本甘棠集研究》。
- (8) 杨铭著：《吐蕃统治敦煌研究》。
- (9) 饶宗颐主编：《敦煌学文荟》。

《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由饶宗颐主编，已出版及排印的有八种：

- (1)王辉著：《秦出土文献编年》。
- (2)饶宗颐、李均明著：《敦煌汉简编年考证》。
- (3)饶宗颐、李均明著：《新莽简辑证》。
- (4)王素著：《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
- (5)王素、李方著：《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
- (6)刘昭瑞著：《汉魏石刻编年》。
- (7)陈国灿著：《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
- (8)李均明著：《居延汉简编年》。

其他在撰写中有下列各种：

- 胡平生著：《楼兰文书编年》。
- 姜伯勤著：《唐代敦煌宗教文献编年》。
- 荣新江、余欣著：《晚唐五代宋敦煌史事编年》。

莫高窟储藏的经卷图像早已散在四方，据粗略统计有数万点多，目前正在清查，作初步比较可靠的全盘统计。这些秘笈为吾国文化史增加不少的研究新课题，同时开拓了不少新领域，为全世界学人所注目。近日欧洲方面，特别在英京已有《国际敦煌学项目通讯》(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缩写为IDP)的刊物。我和日本藤枝晃教授被推为资深 Editor 人物之一，殊感惭愧。目前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还有甲骨学、简帛学部分，忙不过来，只好挂名附骥，聊尽推动之责。我于上文列出的各种工作，我要衷心感谢得到国内多位年轻有为学者的支持，还希望有力者对我们鼎力充分的饮助，使我能够继续完成这一心愿。以渺小之身，逐无涯之智，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我这一点涓滴的劳绩，微不足道，匆促写出，倍感惶悚，就到此为止，算是交卷了吧。



《周易》中的决策管理思想

余敦康

余敦康，湖北汉阳人，1930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职。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第九届委员。

主要著作有《易学今昔》、《周易现代解读》、《汉宋易学解读》、《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承担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四卷八册)、《中国哲学发展史》(主要执笔人之一)、《中国佛教史》(主要执笔人之一)。

我们可以把《周易》的哲学思维分为三个层次：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次虽然非常分明，但是它们的内涵却非常高深。我在这里所讲的，一定程度上把它们庸俗化了。我们思考天道，观察世界，首先需要有非常宏远的、开阔的眼光，这是宏观的层次。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宏观的眼光，看整个宇宙，看整个世界，看整个民族。政治家不关心宇宙，他们关心一个国家，关心一个区域，这就是中观。具体到某一个人就是微观。实际上这三个层次是不能分割的，而是应该把这三方面合而观之：既有宏观，又有中观，也有微观，合

而观之，才是完整地解决问题的方法。

◀ 中西方对宏观的不同看法 ▶

（一）宇宙是生命不断生、长、收、藏的一个过程

中国人往往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在阴和阳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就是有机的宇宙观。孔子看了整个世界，得出“元、亨、利、贞”四个字。只要懂得“元、亨、利、贞”这四个字的内涵，就能够理解中国有机的世界观、宇宙观的含义。

“元、亨、利、贞”在《周易》中原来没什么解释，孔子后来从义理哲学上解释说，这四个字表示：春、夏、秋、冬。元，就是天要它生，就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的诞生。春天万物生，但只是生而已，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到了夏天怎么样？万物生长，长得非常茂盛。到秋天结果子了，就收起来了，就是秋收。到了冬天，就把果子放在仓库里藏起来，就是冬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就是“元、亨、利、贞”所表示的意思。从宇宙论来说，这四个字就表示宇宙的“生”。《周易》解释宇宙，用了“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样一句话，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生”，“生命”的“生”。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宇宙看成一个机器，而是看成一个生命不断生、长、收、藏的过程。

如果春、夏、秋、冬这么循环发展下去，到了冬天是不是就到了世界末日呢？不会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中国人永远对未来、对宇宙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这叫“贞下起元”。整个宇宙就是这么发展的：元、亨、利、贞；元、亨、利、贞……因为“贞下起元”，到了贞的时候又来一个元，这叫“生生不已”，从来都不会停止的，如此